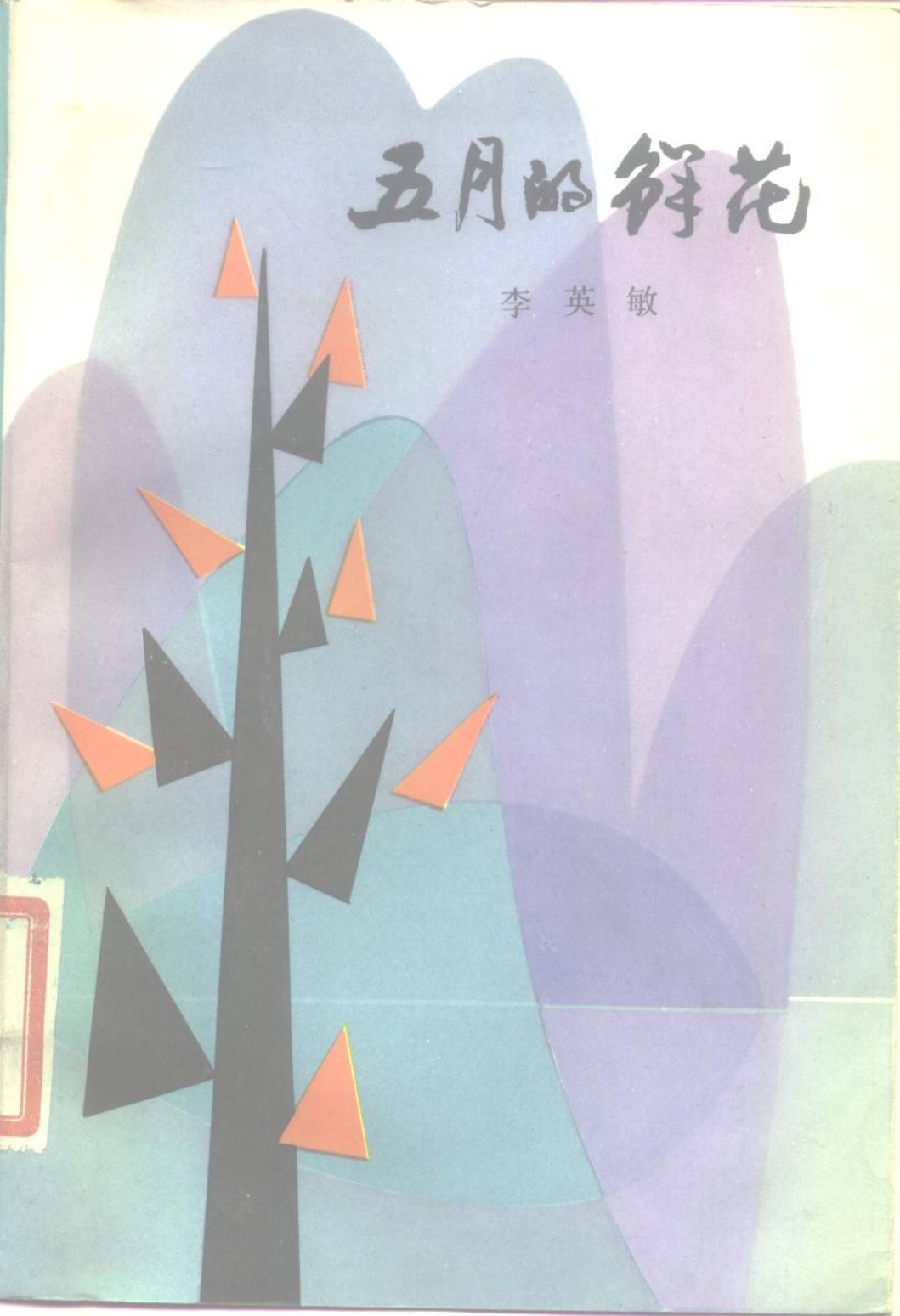


五月的鲜花

李英敏



李 英 敏

五月的鲜花

目 录

丰碑	1
椰岛英风	24
五指山上飘红云	82
姨母	97
越过海上封锁线	113
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126
敌后办报	136
红树林里的战斗	148
天涯寻亲记	154
银灰色的童年	183
海角少年	198
从封建堡垒到革命摇篮	225
窃火记	235
珠城风雨	245
我的第一个堡垒户	255
五月的鲜花	262

丰 碑

一座丰碑，一座导航塔

五指山咧五条溪罗，
你辨哪条载水多？
你辨哪条流下海？
你辨哪条流回来？

五指山咧五条溪罗，
北边那条载水多，
国贼失败流下海，
红军胜利流回来。

.....

这首朴实无华的《五指山之歌》，是我跟随部队进军五指山时，在篝火旁边听黎族歌手唱的。这是一首真正的民歌，歌曲歌词都是黎族人民谱写的，表达了他们对我党我军的朴素真挚的感情。

我第一次看到五指山的主峰是在一个晴朗的春天。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巨人的手掌，南天一柱。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的深入发展，我认为五指山是海南各族人民革命的导航

塔，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各族人民的记功碑，一座真正的革命丰碑。

关于五指山，黎族、苗族和汉族人民都流传着美丽的神话和动人的诗歌故事，收集起来可以出版好几十本书，编许多出戏剧，拍摄许多部电影，但是我以为最美好最动人的，还是我们的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以五指山为中心进行的一场革命斗争，这是一首史诗，有待于同志们去写作的革命史诗。

作为五指山这场革命斗争的参与者、目击者，是有责任写点东西的。二十多年前，当我半路出家从事文艺创作时，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由于自己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加上二十来年的意外变故，写出来的一部分原稿全毁了，连《五指山之歌》电影剧本，至今还禁锢在冷宫，因此，我很难心安理得地生活。

当然，我还是要写的，但读者已等待太久了，而我又很难找出一个完整的写作时间，只好把一些素材、一些想法先写一点，对海南的老战友的盼望和督促，聊以塞责吧。时间太久，加上个人记忆力有限，难免错漏，望知情的老同志补正。

我再重复一句话，这是个人的经历体会，不是什么信史、正史，只供参考，不足为凭，得用两句老话：“文责自负”，“信不信由你”。

算作引子吧。

从《红色娘子军》说起吧

你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吗？这是我们海南岛各族人民，不，应该说是中国人民引以为荣的、给我们无限欢慰和鼓舞的优秀影片。不管林彪、“四人帮”用尽一切卑污的手法，企图歪曲它，占有它，却无损于影片的光辉，吴琼花、洪常青

永远活在海南各族人民的心里。

据说,《红色娘子军》开始放映时,曾引起海南一些同志的议论,认为影片某些细节,不尽符合生活的真实。对这个问题,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作过解答:“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

《红色娘子军》这个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初期,正是工农红军第一次进入五指山区,和黎族、苗族、汉族人民一起建立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高潮的时候,也就是这首壮丽的史诗的第一章。

工农红军为什么要进入五指山区呢?这里有许多故事和传说。

一九二七年,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我们民族的精英、革命的忠贞之士投入了血海深渊。但是革命不可侮,人民不可欺,在“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的枪声中,一支真正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子弟兵建立起来了。我们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掩埋了战友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了武器。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打开了中国(当然包括海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甚至缺少必要的军事知识,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特别是由于机会主义者的破坏,我们的血流得更多。从一九二七年六月起,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人民武装,对抗反革命政变。在短短的两三年间,海南的武装斗争,经过失败、再起,再失败,再干,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了,王文明、杨善集、徐成章、冯平、黄学增……,大伙都在思索、寻找一条坚持到底、争取胜利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琼崖工农红军派代表到江西,出席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带来了中央苏区的经验:建立山区革命根据地,团结各族人民,坚持游击战,夺取最后胜利。

我没有参加第一次进入五指山区的斗争，缺少第一手材料。但是我看到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长、洪常青式的英雄王文字同志一篇怒斥群妖的演说。当敌人（国民党独立旅长陈汉光）嘲笑红军的挫败和王师长被俘时，王文字大义凛然说：“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牺牲，死无所憾。有一件事使我梦魂难安的，如果我们当时坚决执行毛委员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你们别想走进五指山，也别想称王称霸……”可惜这份材料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但我确是亲自看过的。

冯白驹同志生前曾对我说过，在黄学增同志被捕牺牲，由他发起重建琼崖特委后，他经过香港到上海开会，见过周恩来同志。关于海南武装斗争的方向，周恩来同志也是强调建立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和建立根据地三大任务。冯白驹同志这段话是说得很具体的，周恩来同志的音容笑貌都叙述得很详细。

那是一九三〇年以后，琼崖特委机关被破坏，黄学增同志壮烈牺牲，由冯白驹同志（当时是澄迈县委书记）发起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重新建立琼崖特委，冯白驹同志被代表们推选为特委书记，这是冯白驹同志主持海南岛工作的开始。为了明确今后的斗争方向，冯白驹同志化装秘密到香港找广东省委，辗转到了上海，找党中央。党中央对海南岛的斗争非常重视和关怀，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接见冯白驹同志，安排冯白驹同志住到一个同志家里，周恩来同志仔细听取了海南岛武装斗争的报告，给予很具体的指示，谈了整整两天，冯白驹同志接受这些指示，回海南岛掀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新高潮。

工农红军就是按这个意图，第一次进入五指山区，东北面从琼海、屯昌、定安推进到母瑞山，西南面从万宁、保亭、陵水推进到六弓七弓吊罗山，在分配土地的高潮中，工农红军扩大到一个师三个团，革命中心在母瑞山，革命影响遍及五指山

地区。

正当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和深入时，极“左”的东西出现了，先是李立三的“集中攻打大城市”，残酷屠杀迫害不同意他们做法的好党员好干部。一九三二年，红军全部拚光了，师长王文字落到敌手，英勇就义。我们的党组织、工农民主政权都给摧残殆尽，不用说，什么根据地都没有了，最后剩下冯白驹同志和不到二十个干部和战士，在母瑞山吃革命菜、盖芭蕉叶，艰苦坚持一年多，最后回到琼山老区，和李黎明、刘秋菊等同志会合，收拾残局，重新开始。

第一次进入五指山区的失败，主要是“左”倾机会主义干扰、破坏造成的。在这段历史中，不仅有《红色娘子军》的动人形象，还有象王文字同志光照人间的英勇就义，冯白驹同志在母瑞山带领男女战士艰苦卓绝的坚持斗争，刘秋菊同志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双枪将”和“飞将军”的革命传奇。

在第一次深入五指山区时，黎族、苗族人民对革命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付出的痛苦牺牲的代价也不小。在革命遭受挫败以后，军阀陈济棠、陈汉光把黎族苗族人民作为战利品，他们把许多黎族妇女押送广州，囚在木笼里，摆在永汉公园，作为原始人、珍禽异兽展览而收取门票。当然，反动派种下的仇恨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指山武装起义，不能说和这是毫无关系的。

历史是人民写的，每前进一步，都留下深刻的痕迹。

艰难的历程

一九四三年初夏，在澄迈县六芹山，在长满了松树的荒山野营里，特委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我军当前作战方向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冯白驹、王伯伦、黄魂、李振亚、王业

熹，还有罗文洪和我等。

当时，我们纵队的主力，刚从琼山、文昌老游击区出来，准备开辟新的地区，兵力分布是：一支队在琼山的羊山地区，二支队一部分在老区，一部分跟司令部，一部分从文昌县挺到昌江、感恩和崖县交界地方，三支队在万宁的六连岭地区，四支队在占县临高地区，五支队在定安的龙门、岭口地区。因为地区辽阔，兵力分散，问题的焦点是我们的主力该摆在哪里，具体说来，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根据地？

李振亚同志是从南部回来的，一年多来，他指挥一个从地方大队升格主力的队伍，开辟了陵水保亭地方的山区根据地，就是三十年代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振亚同志提出，把主力放在这里，向五指山推进，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可是，振亚同志的建议，遭到多数领导人的反对。从黄魂同志的发言中，我知道冯白驹同志和特委大多数同志，还是想把主力放在琼山文昌附近，等待时机，重新回到老区去。

他们意见分歧的原因是什么，这得从头说起。

由于执行王明路线，琼崖工农红军的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经过四、五年的惨淡经营，艰辛的积聚力量，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云龙誓师抗日时，总算勉强摆出一个营的兵力。日寇侵略海南时，力量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来之不易，倍加珍惜，在我和冯白驹同志长期相处中，他对这支队伍的壮大发展，比什么都重视，他使用这支部队非常小心谨慎，没有谁比他更懂得：削弱或者失掉这支队伍意味着什么。

根据地问题，自从第一次进入五指山区失败以后，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实在说，那时连一支比较正规的有战斗力的队伍还建不起来呢。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我军的力量的不断壮大，革命根据地问题又迫切地提出来了。党中央、广东省委在指示中一

再提起这个问题，一九三九年冬，林李明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报告工作时，中央指示我们，要我们建立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毛主席还亲自用红铅笔勾画出五指山区，语重心长地说：“有了根据地，我们才能休养生息，发展壮大力量，迎接全国的大反攻……”为了建立根据地，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派了庄田同志、李振亚同志和一批军事、政治干部，无线电报务员、制造地雷、手榴弹的技术员。在这个问题上花心血最多的，是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为了保证党中央和海南的信息畅通无阻，周恩来同志亲自布置购买和运送无线电收发报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前后达三次之多。

第一次是一九三九年冬，当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知道我们敌后游击战争的困难时，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发电机，派了台长、报务员、译报员，通过国民党和日寇重重封锁线，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到了海南岛。这对我们敌后军民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对党组织说来，有了中央直接领导和帮助，政治思想和军事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可靠的保证。不幸的是，电台刚和党中央联系上不到一年，在激烈的战斗中，收、发报机丧失了。以后党中央和周副主席还想给我们送来新的电台，但由于交通线的破坏，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没有办法做到。第二次是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时，周副主席又给我们送来收、发报机，可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在运送的途中丧失了。第三次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周副主席再一次给我们送来无线电收、发报机，又一次派来报务人员，这一次胜利到达了。从此以后，海南党组织、海南军民，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指挥领导下，建设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配合野战大军渡海作战，解放了全海南岛。

党中央周副主席给我们三送电台就是一首壮丽的史诗，可惜在《椰林曲》中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后来有些人把这件事写

成惊险的故事，那是不大真实动人的。

抗日游击战争开始以后，我们的琼山文昌有一小块根据地，这是个老苏区，党组织很坚强，群众条件很好，我们的指战员大多数是这一带地方人，军民关系自然很好。缺点是这个地方太狭小了，比较巩固的也不过十来个乡，而且地处平原（有些是丘陵地带），公路交通发达，离敌人占领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海口市很近，敌人决不放松，拚死和我们争夺。

一九三九年五月，日伪军对我琼山文昌地区进行一次大扫荡，使我们领导机关深切感到，非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不可。但对根据地的选择，是很伤脑筋的。当时的五指山是国民党的巢穴，它的守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专员公署和十几个流亡县政府都在这里，还是国共合作的局面，当然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五指山区以外的地方也很难，地形比较好一点，人口多，物产丰富一点的，国民党那些“游劫队”拚命和我们争夺，选来选去，我们于一九四〇年初在澄迈、屯昌、临高边界的美合山区住下来。美合山区地理条件很好，地方辽阔，到处是高山密林，缺点是人口少，我们没有什么工作基础。即使如此，我党我军经营几个月，也稍具规模：有学校、医院、修造武器的工厂、供销社、电台、报社等，特别是学校，有党校、随营军政学校、琼崖公学，学生有好几百人。高涨的抗日情绪，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敌后人民向往的地方。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躲在屯昌南坤的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日寇伪军，对我美合根据地发动突然袭击，由于根据地建立不久，群众基础薄弱，我军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还存在弱点，为了避免过度消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我军只好忍痛退出美合根据地。

退出美合根据地以后，一九四一年二月，特委和我军主力又到回琼山文昌老区来，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当时有主人张

向万宁陵水山区发展，有人主张向澄（迈）临（高）占（县）山区发展，五指山区也有人提出过，大家感到不现实不理想。以后实践证明，回琼山文昌老区是对的。我参加革命以来，琼文老区的群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政治觉悟高，组织性很强，为了支持革命，不惜牺牲一切。我军回到这里，就象斯大林所讲的故事，那位无敌勇士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在老区人民不惜任何牺牲代价的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奋战，我军终于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共内战，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我军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从不足两个支队兵力，发展壮大到五个支队，战斗力也大大提高了。

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的。正当敌后抗日力量壮大发展时，日本侵略者就张牙舞爪扑过来。一九四二年五月，敌伪军在我琼山文昌老区建立十多个据点，组织好几支讨伐队，对我老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妄想竭泽而渔，一举消灭我军主力。前面说过琼山文昌老区的群众条件是很好的，就是地处平原，地区狭小，在敌人的蚕食扫荡下，大部分变成了无人区，损失非常惨重。从四二年冬天起，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队主力，逐步退出琼文平原老区，向西向南发展，想在敌后建立新的根据地。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初夏在澄迈六芹山争论的历史背景。

就在这场争论以后，几乎整整一年，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各地部队，都经历一场最艰苦最严重的考验。饥饿、寒冷、疾病、死亡，有多少好同志都牺牲在艰苦岁月里。我写的《南岛风云》，不过是这段生活的一点痕迹。特委、司令部、民主政府就住在澄迈的六芹山里，原始森林掩护着我们，我们就和飞禽走兽作朋友，过着原始人的生活，有时真想大喊一声：“我要战斗！”但是看到冯白驹同志和许多老同志的坚定沉着，自己也强忍下了。

艰难啊，艰难。

生活上的艰苦，肉体上的折磨，那是算不得什么，最痛苦的是电台的丧失，和党中央失掉联系。当时，我们曾设法从敌人那里夺得一台收音机，改装起来，只能抄收新华社的新闻稿，因为机器陈旧，抄收不全，即使如此，也给我们精神上极大鼓舞，能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情况，根据地建设的报导，以及国际国内的政治动向，在深山密林里算是极大的安慰。但是对党中央的领导意图，只是从电讯中加以推测。有一次，我们在新华社电讯中，收到这么几句话：“琼崖冯白驹同志：你处情况如何？请答复，请答复。”这显然是党中央寻找我们这个和母亲失掉联系的孩子，可是我们没有电台，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吗？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以后……

是谁给我们打开了道路？

一九四四年，我们在澄迈六芹山碰上两宗喜事。第一件是党中央决定把我们的部队正式命名为华南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自从一九四二年内战最激烈时，周副主席给我们送来的收发报机丧失以后，我们和党中央就中断了联系，这一次，是党中央派交通员老梁来找我们的，我们和党中央总算联系上了。第二件事，四支队给我们送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那就是王国兴同志，他是受黎族人民的委托，来请红军进五指山打国贼的，这真是天大的喜事。王国兴同志告诉我们，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和野蛮迫害的黎族、苗族人民，一九四三年七月，在王国兴同志领导下，举行了气壮山河的武装起义，依靠大刀、弓箭、鸟枪等原始武器，消灭了几十个国民党的县区乡政权和大量敲骨吸髓的“游劫队”，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五指山区的统治。这场带自发性的英勇起义，

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得不到各方面配合援助，在反动派残酷镇压下，终于失败了。黎族、苗族人民遭受到最野蛮的屠杀摧残，起义地区变成一片废墟，无数人民陈尸荒野。但是黎族人民并没有屈膝投降，他们走进原始森林，继续坚持斗争，基本力量还保存着。王国兴同志来找我们，就是要我们派大军进五指山，帮助他们消灭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

象个忠厚朴实农民的王国兴，我把他看作了不起的英雄，他仅仅以七个峒（即等于乡）人马和原始武器，就敢于高举义旗，痛打那些野蛮残暴、武器精良的反动军（他们确切地叫国贼），失败了绝不投降。王国兴把我们叫作“红军父母同志”，我问过这位七峒奥雅，怎么想到找红军的？他说他十多年前就知道有红军，是黎人、苗人的好朋友好兄弟。当然，他为了请红军，还在黎族人民中编了一段神话，说五指山上飞起五朵红云，黎母娘娘的意旨，黎人要活命就要请红军进山。这就是我们通常听到的五指山五朵红云的故事。

照我的感受，真正的“父母同志”是黎族、苗族人民，由于他们的武装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又由于他们专程请我们进山，大大提高了我们第二次进入五指山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和兄弟民族之间，不存在救世主，也不存在恩赐者，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取得胜利的。

特委和纵队司令部经过反复讨论后，决定派一支由郑放、许世淮同志带领的武装工作队，随同王国兴进山。主要是了解情况和帮助黎族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我们的主力部队进山创造条件。这个决定是对的，但不易说服王国兴。他想我们一下派出大批部队，很快就把国贼消灭。经过细致的耐心说服工作，王国兴勉强同意带领这支小部队进五指山。

应该说，先遣队进山做了不少工作。可是到底缺乏经验和周密调查，对困难估计不足，当四支队一个主力大队进山时，

得不到必要支援，受到一些损失而退出来。王力征同志就是这次牺牲的。

这时，我党政军领导对进军五指山意见完全一致了，为了加强领导，特委和纵队司令部从澄迈迁移到临高儋县白沙边界地方，除了四支队外，另组建了一支主力部队——挺进支队，由李振亚同志兼任支队长，统一指挥进军五指山的战斗。

值得书写一笔的，是冯白驹同志的为人。在是否进入五指山问题上，冯白驹和李振亚同志之间，有过激烈争论。但当情况变化，进五指山成为我党我军迫切任务时，冯白驹同志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意见，并且把进军的军事重任交给振亚同志，光明磊落，不要阴谋诡计，用人唯贤，这是冯白驹同志高贵品质，深得干部拥护的主要原因，这对进军五指山的胜利，是有重大影响的。

李振亚同志是个忠诚老实的红军指挥员，对执行党的任务是非常坚决，责任心非常强，批评是不留情面的，当党决定进军五指山，一切不愉快的过去都烟消云散了。为了进军五指山，李振亚同志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密细致，他和我、罗文洪研究进军的政治思想工作，除了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以外，还制定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充纪律，我记得其中一条，是不准购买和宰杀母猪，这是振亚同志经过调查提出来的。至于侦察工作、后勤工作，那就做得更细致了。

正当我们主力部队在白沙县阜龙乡誓师进山时，党中央又派了符气岱同志来看望我们，代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慰问坚持敌后苦战的指战员们，并指示我们尽快建立根据地，迅速发展抗日进步力量，迎接全国大反攻。这真是一场及时雨，滋润每个人的心田。

就这样，李振亚同志指挥的挺进支队，在马白山同志指挥的第四支队的紧密配合下，在黎族、苗族起义武装和人民大力

支援配合下，一举攻下国民党在白沙最大的据点设在小水乡的守备团的团部，给这些吸血的山蚂蝗以歼灭性的打击，在短短的两三月间，解放了五指山北部地区，包括现在的白沙、琼中的大部分和东方县的一部分，我们第一次获得这么大片根据地，黎族、苗族人民从死亡的绝境中获得了生机，我党我军初步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正在这时候，五指山的南面，在陵水保亭山区建立根据地的部队派了陵保县抗日民主县长吴乾鹏同志等人，穿过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来找我们，在路上，吴乾鹏同志见到“苗王”山熊伯，说服他和我们合作抗日。山熊伯派了他的儿子和一批青年到我们部队“学本领”。这样，山北和山南建立了经常的交通联系，黎族、苗族和汉族成为亲密的战友。

有件事使我永志不忘的，当我军打下伪守备团的团部时，发现有两竹竿黑糊糊的东西，后来弄清是国贼军屠杀黎族、苗族人民挖取的人肝人胆，这种惨绝人寰的情景，使我们的指挥员更深地懂得进军五指山的重大意义。

本来，我们的进山部队，准备南下乐东、保亭，彻底消灭国民党这些败类，解放五指山全境的，就在这节骨眼上，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党中央和朱总司令给我们更重大的战斗任务。因此，这次进军五指山（从整个历史说是第二次进军）就告一段落。

在五指山演出的几幕“戏”

日本投降后，我军解放了儋县、临高、屯昌以及澄迈的一部分，连同原有的白沙、琼中、东方，除那大据点、石碌矿山和加来机场以外，都成为我们的天下，我们从来也没有过一百九十多座城镇的大片解放区，我们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也有

很大的发展，冯白驹同志对我说过，从海南岛开始武装斗争以来，没有今天这么强大过。

当然，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日本侵略者也不甘心，一切反共反人民的势力都不会甘心。红脸的、黑脸的、白脸的都出现了。这时候，五指山区已经成为我们可靠的后方根据地了，我们把临高的南丰市作为我们的接待站，我们的前哨阵地，许多好“戏”就在这里演出。

第一幕戏是美国人当主角。他们派来一位上校和一名上尉，主要是劝我们放弃接管日军的武器，不要攻打鬼子据点，还要我们放弃解放区，让国民党在海南恢复统治。这个山姆大叔实在太笨，他的话既骗不了人，也吓不倒人，在我们一顿驳斥下，只好夹起尾巴逃走了。

值得补写一笔的，是那位三十来岁的美军上尉，他自我介绍说，他到过延安，参加美军观察组，“很了解”我军，他在那位上校和我们争论时，不声不响，临走时留给我们一封信，这是英文信，事后才弄清楚，其中有几句话：“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蒋介石将军要打你们，要消灭你们，希望你们小心，不要上当。”事后证明，这位美国朋友没有错。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美国人民的儿子。

接着是驻守那大的日军指挥官，舞一特海军陆战队的司令，他仗着美国新主子的势力，要我们退出南丰和那大附近的城镇据点。这些败军之将还敢称勇？！我们部队刚拉开打仗的架势，他们就连滚带爬的跑回那大市去了。

最有意思的还是国民党。日本投降三、四个月，他们才在广西拚凑了一个四十六军，急不可待来海南“受降”。他们一来到，就收编了全部汉奸伪军，向我们收复失地来了，但是四十六军的军长韩练成，还要演一幕“文明戏”。他要我们派代表